

李翼 主编

一位杰出的世界女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K812
35
/

八位杰出的世界女性

李 翼 主编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以感人的笔触，生动而真实地介绍了世界杰出的八位女性的生平经历，她们的奋斗的人生，高尚的品德，事业的成就以及她们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这八位女性是按照她们生平时间先后排列的。她们是女作家乔治·桑；“明灯女士”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国际妇女运动之母蔡特金；女性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镭的母亲居里夫人；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一代影后英格丽·褒曼。

作者把这本书献给广大女青年们，愿它成为她们了解人生意义的有益读物。

八位杰出的世界女性

李 翼 主编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北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4375 字数 120 千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7-81014-691-2/G·560

定价：3.00 元

献 给

广大的女青年们

责任编辑:林心敏

封面设计:张媛

封面题字:王立志



ISBN7—81014—691—2/G·560

定价: 3.00 元

目 录

- 一、女作家乔治·桑的故事……………王文融 (1)
- 二、“明灯女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故事
……………汪又红 (21)
- 三、国际妇女运动之母——蔡特金的故事
……………陈 军 (44)
- 四、女性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李允经 (64)
- 五、镭的母亲——居里夫人……………蒋 雯 陈 军 (77)
- 六、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王 鑫 (98)
- 七、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玉质瑛 (117)
- 八、一代影后——英格丽·褒曼……………李 晔 (146)

女作家乔治·桑的故事

王文融

1804年7月1日的夜晚，巴黎一幢简陋的住所里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一位容貌美丽，风度飘逸，身着漂亮的玫瑰红长袍的女子，正合着音乐的节拍跳着四组舞。突然，她略感不适，便退入隔壁的房间。不久，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个小生命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女作家乔治·桑。女婴的父亲正在拉提琴，立即给女儿起名奥萝尔，意即曙光。小孩的姨妈说：“孩子在音乐声中，在玫瑰红的衣裙里诞生，将来一定幸福。”

且不说这预言是否灵验，婴儿的父母眼下却遇到了难题：他们在孩子降生前秘密结婚，但奥萝尔的祖母拒绝承认这桩门第悬殊的婚姻。母亲索菲，一名捕鸟人的女儿，本人曾是舞女，有过两个情人，还带着个私生女。父亲莫里斯是拿破仑帝国的军官，且有贵族血统，他的母亲是战功显赫的萨克森元帅的私生女，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母亲是堂姐妹，18岁时嫁给一个小要塞的司令官，不久丈夫一命呜呼，守寡15年后，她与比她年长32岁的贝里地区总包税人杜潘·德·弗朗克依结婚。杜潘夫人是伏尔泰和卢梭的崇拜者，她自称抛弃了贵族的偏见，但不能容忍儿子与“荡妇”结合，毁了自己的前程。后来杜潘夫人虽然接纳了儿媳，但是婆媳之间始终格格不入。

奥萝尔4岁时，随身怀六甲的母亲去西班牙找父亲，莫里斯当时在马德里任缪拉元帅的副官，母亲生下一个小弟弟后，全家人乘一辆四轮马车，穿过尸横遍野的战场，回到法国贝里地区的诺昂镇，与祖母团聚。1793年，杜潘夫人在这买下了一幢具有路易十六时代建筑风格的宅第，虽不豪华，但宽敞，舒适，环境清新优雅。

姐弟俩在艰难的旅途中染上了疥疮。回到诺昂后，奥萝尔很快恢复了健康，弟弟却夭折了。不久后的一天，父亲骑着一匹从西班牙带回来的烈马去探望朋友，夜里回来时被突然受惊的马摔在一堆石头上，气绝身亡。家庭连遭不幸，小奥萝尔从此便生活在两个女人中间了。而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女人呵！

母亲多才多艺，有一双巧手，终日忙个不停。尖嘴利舌，讲起话来和巴黎的顽童一样辛辣而生动。她情感热烈，有点喜怒无常，但为人慷慨。祖母性格沉稳，举止庄重，是位悠闲的贵妇人。她曾在与路易十四秘密结婚的曼特依夫人创建的圣西尔修道院受过教育，趣味高雅，爱好文学，且有音乐才华。她喜欢孙女，希望把她培养成举止娴雅、姿态优美的淑女。她教奥萝尔如何坐立，行走，捡手套，拿刀叉，打招呼，指物件……，母亲对这些繁琐礼仪却嗤之以鼻。婆媳俩为争夺奥萝尔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小女孩身上既有贵族血统，脉管里又流着平民的血液，她同样爱这两位亲人，感到“母亲和祖母争夺我的每一瓣心”。但是，她不能容忍祖母和周围的其它贵妇对母亲的贫贱出身表示的轻蔑，在发生冲突时，她总站在母亲一边。

终于，在奥萝尔7岁时，家庭关系破裂了。为了女儿能

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当诺昂的继承人，索菲接受了杜邦夫人提出的条件，拿了一笔钱离开女儿到巴黎生活。撕心裂肺的别离！在需要母亲的温柔慈爱的小小年纪，奥萝尔在诺昂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尝到了孤独和恐惧的滋味。

这是个爱静思默想的小女孩。当她只有三四岁，和母亲住在巴黎的一间阁楼上时，母亲常把她放在一只没生火的小脚炉上，周围摆上几张椅子，给她看画册，讲童话故事，还教她背诵寓言。小家伙可以整整几小时地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给自己编故事。在诺昂，她幼小的心灵感受到大自然的色彩缤纷。一片轻柔的浮云，一道艳丽的阳光，一溪清澈的流水，天上的飞燕，树上的绿枝，都激发起她美妙的想象。她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饲养鸡羊，参加田间劳动，听绩麻工人守夜时讲传奇故事，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使她成为毕生热爱乡土的人。

杜邦夫人担心家族的女继承人变成一个野孩子，在孙女13岁时，送她进了巴黎奥古斯丁英国女修道院。这是一所深受法国贵族好评的女子寄宿学校，嬷嬷全是英国人。奥萝尔学习音乐，绘画，教育理论，意大利文，尤其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英文。

在修道院的头一年，奥萝尔是个出名的淘气鬼，上房顶，钻地下室，到阴暗的地道里寻找被幽禁的“受害者”，这些顽皮的游戏和探险活动全有她的份。不少修女在寄宿生中找一个“干女儿”，以便给予格外的关心和照料。到了第二年，奥萝尔大胆地要求全院最聪明、最慈祥的阿莉西娅嬷嬷认她作干女儿，她试图在这位美丽高雅的修女身上找到她渴求的母爱，并满足她尊敬和崇拜某个人的强烈需要。她阅读

《福音书》、《圣徒行传》，把休息时间全花在小教堂里，祭坛，彩绘玻璃，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画像，殉道者的勇气和坚忍精神鼓舞起她的虔诚的热情，她感到自己皈依了天主教，并且萌生了献身上帝，当一辈子修女的志向。听她忏悔的指导神甫是位和善、督智、机敏的耶稣会士，他责备奥萝尔沉湎于对完美世界的遐想中，而忘却了自己在现世的责任，规劝她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奥萝尔服从了。她摆脱了精神恍惚的状态，恢复了以往的快乐，还在修道院中组织猜谜，导演喜剧，赢得了同伴的喜爱，修女们的赞许。

杜邦夫人为孙女的虔诚担心，又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尽快给奥萝尔完婚，于是在1820年春把她接回了家。

回到祖居的奥萝尔，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脸蛋俊美，一头褐发，丝绒般的眼睛又黑又大。她有知识，会唱歌，弹琴，画画，跳舞；她还是位富有的女继承人。本来这些优越的条件可以引来众多的求婚者，但是母亲的卑贱出身令一些前程远大的青年人望而却步。奥萝尔并不急于结婚。她如饥似渴地读书，经常从晚上10点读到半夜3点。她从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和卢梭的《爱弥儿》中觅求精神食粮，她研究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洛克、帕斯卡尔、蒙泰涅、富兰克林的哲学思想，阅读但丁、维吉尔、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歌和剧本。

祖母瘫痪在床，年轻姑娘成了一家之主。她的同父异母哥哥、轻骑兵上士依波利特教她学会了骑马。为了打猎的方便，她常常头戴鸭舌帽，穿着男人的上装和长裤。原来的家

庭教师是村里的医生和药剂师，他希望得到奥萝尔的协助。于是，她学习解剖学和骨骼学，在自己房间里挂起一幅骨架，陪医生出诊，看护病人，给无助者带去安慰。这些惊世骇俗的行为引起固守传统的当地人的种种非议。奥萝尔蔑视舆论，把那些流言蜚语斥为“畜生的乱叫”。

1821年圣诞节那天，祖母去世了。母亲立即赶到诺昂。她变得性情乖戾，对死去的婆婆谩骂不止，还逼迫女儿结婚，对她实行专横的管束。

1822年，奥萝尔到父亲的一位战友家小住，在那里结识了卡西米尔，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帝国男爵杜德望和一个女仆的私生子。她和他在一起很快活，感到他是那种“善良、诚实、无私的保护者”。卡西米尔也喜欢这个健康、活泼、聪明的女孩。不久，卡西米尔向她求婚，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婚礼于当年9月10日举行，然后新婚夫妇双双奔赴诺昂。

奥萝尔对丈夫一往情深，丈夫也对她温存体贴。转年她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年轻母亲爱他爱得发狂。卡西米尔为管理事务常需出门旅行，夫妻的两地书饱含着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奥萝尔似乎如愿以偿，在婚姻中得到了安宁和幸福。可是，在夫妻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表面上心满意的妻子心底里只剩下两个字：失望。

卡西米尔生性好动，喜欢搜捕猎物，纵酒作乐，结交的朋友尽是些满嘴污言秽语的小乡绅。他对读书兴味索然，听到音乐便溜之大吉。他和妻子没有共同的爱好，不理解她细腻的感情，只要求她白天对他百依百顺，夜晚给他肉体上的快乐。这与奥萝尔追求的理想爱情相距十万八千里。

漂亮的少妇在生活中不是没有机会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男人。1824年在比利牛斯山避暑时，她认识了波尔多法院的代理检察长奥雷利安·德·赛兹。奥萝尔的美貌，才华，文化修养和热情掩盖之下的忧郁迷住了他。奥雷利安高尚的心灵，儒雅的举止，风趣的谈吐，也深深打动了她的心。但奥雷利安不愿勾引有夫之妇，奥萝尔要为丈夫坚守贞操，两人发誓只保持圣洁的友谊。这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直延续了6年。

1829年9月杜德望夫人生下一个女儿，家庭的气氛并没有好转。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卡西米尔与两名女仆关系暧昧，奥萝尔身边簇拥着一群仰慕者，她爱上了在巴黎攻读法律，回乡度假的青年于勒·桑多。1830年12月的一天，奥萝尔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写给她的，留待死后拆封的遗嘱，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的愤恨和鄙视。奥萝尔忍无可忍，当即作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她将去巴黎生活，每年回诺昂过6个月，她的财产归丈夫经管，她只要求一小笔生活费，打算靠自己的力量谋生，一俟经济能力许可便接走孩子。丈夫接受了她的条件。1831年1月4日，她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飞奔巴黎。

1831年的巴黎刚刚经受了七月革命的洗礼，政局动荡，骚乱频仍，权力斗争此起彼伏。巴黎还是文学革命的舞台。具有民主思想，充满浪漫激情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纷纷向旧世界挑战，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旧传统，旧伦理和一切陈腐观念。一部部标新立异的作品引得青年一代如痴如狂。

奥萝尔在圣米歇尔滨河大道一栋房子的阁楼上栖身，临窗可以眺望圣母院和塞纳河。她欣赏飘过屋顶的彩云，雾气朦胧的黄昏，亨利四世铜像周围的翠柳，在新桥古旧的怪面饰上营巢的灰鸽。她呼吸着巴黎的自由空气，心情从未如此舒畅。奥萝尔认识了几个在巴黎的贝里同乡。他们一起在街头散步，一起去听音乐，坐在戏院正厅里为“离经叛道”的新戏鼓掌喝采。为了行动的方便和节省开支，她女扮男装，身着一件长及脚跟的男式灰呢礼服，头戴灰帽，领口系一条宽大的毛呢领带，足登高筒靴，活像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总之，她尝到了独身女子的快乐。

但是她必须挣钱糊口。她原想给人画像，但尝试失败了。于是她想到写小说。或许她是位天生的作家。孩提时代，她给自己编故事的时候，已展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在修道院，她手很勤快，常常把自己的心得和感受记在本子上，写些无韵诗或散文，因此被伙伴们戏称为“斯卡潘”（即笔记本）。为了消磨时光，她在诺昂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如今，她能否把写作当成谋生之术呢？

一个女人要想挤进以男人为主的文人圈子谈何容易。通过贝里地区选出的一位议员的引荐，奥萝尔会见了议员兼小说家德·凯拉特利先生。他直言不讳地对她说：“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奥萝尔笑了，答道：“确实如此，先生。您把这个劝告留给自己吧。”

她没有气馁。一位女同乡把她介绍给另一位贝里籍的大人物亨利·德·拉图什。此人写过剧本和小说，是位出类拔萃的批评家，培养过巴尔扎克、夏尔·诺迪埃等许多天才。他刚接收了一份讽刺性小报《费加罗报》，出于对年轻同乡的

关心，便请奥萝尔参加编辑部的工作。他每天早上给她出个题目，叫她写一篇短评或一则社会新闻，答应文章一经采用，每栏给她7法郎。可惜的是，她的想象力如脱缰野马不受羁绊，她适应不了巴黎评论式的堂皇文体，把每个题目都写得像篇小说。到了一月末了，她只得到15法郎的报酬。于是拉图什劝她还是写小说。

于勒·桑多这时也到《费加罗报》工作。这位于1858年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著名作家，当年只是个苍白孱弱的20岁的青年。奥萝尔和他倾心相爱，志同道合，决定合作写一本小说。经过六个星期的努力，《玫瑰红与雪白》完成了，它讲的是一名修女和一个女伶的故事。署名问题颇费周章，因为两人都不愿或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奥萝尔的婆婆不希望看到她家的姓氏印在一本书上，于勒怕惹当税务官的父亲生气。拉图什建议采用于勒·桑的笔名，解决了这个难题。

1831年4月和9月，奥萝尔按约定两次回到诺昂，每次各住了三个月。与儿女重逢令她高兴，但她的心留在了巴黎。在静谧的乡间，她创作了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印第安娜》。这是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印度洋留尼汪岛上一位美丽纯真的克里奥尔女子和比她大许多的、野蛮鄙俗的丈夫之间发生的故事。来年春天回巴黎时，杜德望夫人带走了女儿和这部长篇小说的手稿。

《玫瑰红与雪白》销路不错，出版商来讨另一本书，并坚持用已小有名气的原来的笔名。于勒拒绝为自己未付出劳动的书署名，一对情侣于是又去请教他们的顾问拉图什，结果采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奥萝尔保留了桑这个姓氏，又给自己取了个男人的名字：乔治。

1832年5月底,《印第安娜》问世了,乔治·桑一夜成名。人们纷纷打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是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显示出作者在心灵和思想上的细腻,女人的笔法时隐时现,但作品的风格和表述的见解雄浑刚健,不可能不出自一个男人之手。《印第安娜》的出现,为传奇小说盛行的法国文坛奉献了一个激情遭到压抑,或被法律所剥夺的柔弱女子的形象,她的命运紧紧攫住广大读者的心,并引起了深切的同情。在贵族的沙龙,在法兰西剧院的休息厅,在圣西门主义者的俱乐部,在办公室,在商店,人人都在谈论《印第安娜》。好挖苦人的拉图什第一个向乔治·桑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巴尔扎克在《漫画》杂志上赞扬她的书构思巧妙,文笔简朴。对作家不留情面的评论家居斯塔夫·普朗什甚至认为她超过了大名鼎鼎的女作家斯达尔夫人,并代表《两世界杂志》向她提出与该期刊合作的建议。

乔治·桑怀着更大的自信继续写作。每天晚上,待小女儿睡着之后,她燃亮灯,奋笔疾书。灯油尽了,她点上蜡烛,仍不停地写,把在她心灵中撞击的情愫和思绪,把在她头脑中映现的一个个人物编织成梦,再把这梦化为文字,直至晨曦透进窗户。

几个月后,乔治·桑的第二部小说《瓦朗蒂娜》出版了。它讲述一位贵族小姐被迫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凡夫俗子,后来爱上了佃户的儿子。这又是一个对自己的婚姻极度不满的女子。小说还描绘了贝里的迷人风光,作者对家乡一草一木的深情凝注笔端,那浓郁的乡野情调令人耳目一新。著名评论家圣勃夫深受这本书的吸引,他说作者“有一把打开人类心灵的钥匙,有创作的才能。乔治·桑这个名字后面隐

藏着一位大作家……”

乔治·桑获得了令人艳羡的文学成就，在私生活中却饱受折磨。丈夫坚持把文弱的儿子送进巴黎一所少年军事学校，9岁的孩子大哭大闹，令母亲肝肠寸断。她按照约定，每年必须离开于勒，与自己早已不再相爱的丈夫生活半年。她想离婚，嫁给予勒，并希望法律把子女判给她抚养。但是于勒体弱多病，游手好闲，还与别的女人厮混。在婚姻生活中她没有找到的理想爱情，在自由恋爱的结合中依然渺无踪影。她失望了，于勒不是她心中企盼的神。1833年初，这对情人终于分手。6年后，桑在令她声名大噪的小说《玛丽亚娜》中，叙述了她这段痛苦的初恋。

为了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乔治·桑笔耕不辍，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莱莉亚》，中篇小说《梅苔拉》、《侯爵夫人》等等。

这些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的早期作品大多是作者心灵的自白，爱情生活的写照，一颗永不满足的灵魂的呐喊。乔治·桑在作品中抨击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愚蠢的社会偏见，要求男女在公民权和爱情上的平等，呼吁改变法律和单一的道德标准。对她而言，爱是生命的同义词，它不仅意味着幸福，还是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甚至是一种信仰。她认为，只要激情是真诚的，一切便是正当和神圣的了。这些新奇的思想，宣扬爱情自由的大胆主张，引起了一些人的称颂，在法国、德国、俄国，在一切读法文的地方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心。同时又导致了另一些人的攻击，愤怒的卫道士们视作者为伤风败俗的危险蛊惑者，把《莱莉亚》等小说列为年轻姑娘们的禁书。

这时乔治·桑已搬到玛拉盖滨河街19号一所较宽敞的房子里，并请了一个女仆做家务，帮她照料女儿。儿子每周从学校回来一次，与家人共度周末。桑闭门写作，只接待几个知心好友，与外界很少接触。

1833年6月，在《两世界杂志》招待同人的盛宴上，乔治·桑邂逅了被誉为“浪漫主义神童”的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这是两颗几乎同时在天际冉冉升起的新星。桑注意到这位早慧的诗人长得漂亮迷人，衣着极为入时，谈吐风雅，毫不矜持，举止彬彬有礼。他太不像她的那些不修边幅，态度随便的朋友。在缪塞眼中，桑算不上美丽，也缺乏搔首弄姿，讨男人欢心的本领，她的全部魅力都汇聚在那双琥珀似的、蕴藏着热情的眼睛里。她和他平日周旋其间的贵妇或轻佻女人似有天渊之别。

他被这完全新鲜的感觉所吸引，几次登门拜访“乔治·桑先生”。他们谈论文学，人生，道德，以及他们自己。一个月后，缪塞向比他大6岁的桑表白了爱情。但她不敢接受，她经历过挫折，对爱情已心灰意冷。但是他说服她，恳求她，向她保证他的爱是永恒的。他需要她，她是庇佑他的天使，指引他的星星，拯救他的救世主。被人需要最能打动她那颗充满母性的心，而诗人的眼泪终于使她屈服。

于是，玛拉盖滨河街19号的大房子里重又响起了欢声笑语。这个敏感多情的青年，这个被喻为“诗歌的春天”的浪漫诗人，才气横溢，对艺术门门精通。他在她家里写轻浮的诗句，画风趣的漫画，喜欢恶作剧，像孩子一般顽皮。乔治·桑怀着情人的喜悦和母亲的宽宏对这一切报之以微笑。缪塞发誓说，他们的爱情将载入史册，像罗米欧和朱丽叶的